

多元報刊群落不均衡生長 ——南京國民政府前十年的報刊生長狀態考

吳廷俊、沈靜*

投稿日期：101年11月21日；通過日期：102年1月21日。

* 吳廷俊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mail: tjwu@hust.edu.cn。

沈靜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e-mail: wdxwjyx@163.com。

《摘要》

南京國民政府是一個弱勢集權專制政府。在這個弱勢的集權專制政府下，雖然執政黨的黨媒在資源獲取上佔有絕對優先權，但是民營報刊還有相當的生長空間。因此，報刊生長和發展呈現多元狀態；干政這一重要的報刊功能尚能發揮，顯示出中國書生辦報的精彩；報紙和報人能夠通過艱苦的鬥爭爭取到幾分新聞自由，為新聞界平添幾分活力。

關鍵詞：生態位、南京國民政府、報刊

引言

南京國民政府前十年是指從南京政府建立到抗戰爆發前的十年，即 1927 年 4 月至 1937 年 7 月，這十年被史學家譽為「黃金十年」。¹在以往的中國新聞史著作中，這「十年」新聞業在革命範式下一般分三部分敘述，即共產黨新聞業、國民黨新聞業和私營新聞業。《中國新聞通史》說，十年內戰時期，共產黨新聞事業經歷從城市到農村的轉移，不僅求得了生存，而且找到一條在農村發展的道路。國民黨的新聞事業，其規模之大、分佈之廣、體制之完備，使中國歷史上任何統治者的新聞事業相形見绌。由於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和生活事業均有較為明顯的發展，私營新聞事業也隨之呈現相對繁盛景象（方漢奇，1996，頁 264, 348, 410）。這樣的敘述當然沒有錯，但是，由於沒有進行「組裝」，讀者看不到這十年中國新聞業發展的整體狀況。

據國民政府內政部 1936 年統計，1927 年全國報紙總數為 628 家，到 1936 年增加到 1,031 家，增加百分之七十多。這僅僅只是數量上的表現嗎？如何全面而準確地描繪這個時期的新聞業並給出恰當的評價？本文試圖從媒介生態學的視角考察南京國民政府前十年的報刊生長狀態，以期對其有較為深刻和科學的認識。

壹、報刊生長的外部環境分析

一、難得而有限的統一

1927 年 4 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8 年 6 月隨著第二次北伐完

成，新疆通電歸順南京國民政府和東三省「改旗易幟」，南京國民政府成為全國統一的政權。雖然這個統一是有限的，² 但是畢竟結束了北洋政府時期軍閥混戰、地方割據局面，中國出現一個難得的統一時期。

在這種相對統一和平環境裏，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嬗變期。新政權建立後，採取一系列發展經濟的政策，平息工潮、統一國內市場、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實現關稅自主，為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帶來良機。在相對平靜的 10 年裏，中國經濟年均增長保持在百分之十左右，是中國進入現代以來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之一。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人口繼續增多，商業經濟展現繁榮景象。

這一時期，文化事業、教育事業和學術研究得到一定重視。國家級現代化學術中心——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使因政局動亂而中斷了的學術建設事業得以繼續與發展；教育事業的制度化建設也取得長足進步；同時，左翼文化運動以及自由知識份子的文化努力更令人刮目相看。

難得的統一局面，相對的和平環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為新聞事業，尤其是民營新聞業的發展，在言論自由、資金調度、廣告收入、設備更新以及物資添置儲備等方面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二、「一黨專政」集權政府

以上是事物的一面，事物的另一面是南京國民政府是一個「一黨專政」的集權政府。1928 年 10 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通過〈訓政綱領〉，以法律形式規定「一黨專政」的方針和「以黨治國」的原則。故南京國民政府又稱國民黨政府。

該政府一方面大肆創辦國民黨新聞機構，另一方面公開提出「以黨

治報」的口號，荒唐地規定非國民黨的報紙除了接受國民黨政府的行政管理之外，還必須接受國民黨的思想指導，將全國的新聞事業納入「一黨專政」的軌道，把整個新聞界「黨化」起來；「黨化新聞界」、「以黨治報」成了國民黨的新聞統治指導思想。

為了「對全國新聞界的有效之統制」，國民黨政府制定一系列的新聞法規，這些法規呈現出一個鮮明的特徵，就是「控制本位」。據《新聞事業法令複編》不完全統計，抗日戰爭前先後頒佈約四十多個新聞法令，專為新聞檢查而設的法規多達二十多個，而標有「審查／檢查」字樣的則有 16 個（李霞，2006）。

1933 年前，國民黨實行出版登記制和事後追懲制，1933 年起開始推行事前預防的新聞檢查制。當年 1 月 19 日，國民黨第 4 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 54 次常務會議通過〈新聞檢查標準〉和〈重要都市新聞檢查辦法〉，並先後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漢口等大城市設立新聞檢查所，要求當地當日出版的日報、晚報、小報，通訊社稿，甚至特刊、增刊、號外等，都要在發稿前將全部新聞稿件送審。〈新聞檢查標準〉規定，「各報社刊載新聞，須以中央通訊社消息為準」，否則，「扣留或刪改」（劉哲民，1992，頁 536-538）。

同時，國民黨還專門創立民營報紙顧問制度，委派國民黨顧問加入民營報社指導具體業務。次年 4 月，國民黨中宣部又成立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上海黨部公佈〈新聞統制之實施方案〉「限制非黨系的新聞業侵略式的發展，干涉非黨系新聞企業托勒司或迭而加形式」（國民黨上海市黨部，1934；轉引自黃瑚，2007）。

廣播電信、郵電等領域也同樣受到嚴控。1928 年先後公佈的〈廣播無線電臺條列〉、〈電信條例〉、〈全國重要都市郵件檢查辦法〉等法規對其嚴格控制；1936 年 2 月專門成立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

先後公佈〈指導全國廣播電臺播送節目辦法〉、〈民營廣播電臺違背[指導播送節目辦法]之處分簡則〉和〈播音節目內容審查標準〉。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民營廣播電臺因違反該指導委員會有關規定而被明令撤銷者就有 9 座，暫停播音者 4 座，受警告處分者 3 座（楊師群，2010）。

應特別指出的是，國民黨的新聞控制是以意識形態為標準。這一點從以下主要法規的條款中清晰可見：

1928 年 2 月頒佈的〈暫行反革命治罪法〉、6 月頒佈的〈指導普通刊物條列〉和〈審查刊物條例〉、1929 年 1 月的〈宣傳品審查條例〉、1930 年 12 月的〈出版法〉、1931 年 1 月的〈危害國民緊急治罪法〉等皆規定報刊絕對不能違反本黨之主義政策，反對或違背本黨主義政綱及決議案者將受嚴懲；換言之，就是對不符合國民黨意志的出版物一律「查禁」。

據國民黨中宣部印發的秘密檔案記載，自 1929 年至 1934 年，被查封的書刊約 887 種。而據其《中央宣傳工作概況》統計，僅 1929 年全年查禁的刊物共 272 種，比 1928 年猛增 90%（楊師群，2010）。

總之，在「黨化新聞界」的口號下，國民黨不僅控制黨媒且要控制全國所有新聞媒體，制定各種各樣以控制為本位的新聞法規，為新聞媒體生長和新聞業發展設置種種障礙，使新聞媒體尤其是異黨新聞媒體、民營新聞媒體的生長受到種種不應有的限制。

三、弱勢的專制統治

南京國民政府雖然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專制獨裁政權，但是它的獨裁專制能力很弱，是一個弱勢的獨裁專制政權；這個問題可從事實和

價值兩個維度分析。

從事實維度上，執政黨對國家統治力的強弱體現在組織強度和黨治力度兩個層面。而組織強度主要表現在黨員「量」與「質」、組織結構和黨內派系結構三方面。

「黨員人數的多寡，是衡量一個政黨組織實力的重要指標之一」（王奇生，2003a，頁 40），根據有關統計，1928 年國內普通黨員為 252,228 人（湯向東，2004，頁 125），到 1937 年 1 月國內普通黨員共計 526,977 人（王奇生，2003b），十年間增加不到三十萬。進一步考察國民黨黨員與全國人口比例，則更清楚地顯示出國民黨組織力量的弱小。以 1935 年為例，當年黨員與全國人口比例約為 1：1300（1935 年全國總人口約 462,150,000 人），若將軍隊黨員和海外黨員摒除在外，則這一比例為 1：1990，遠低於同時期蘇聯、義大利等一黨專政國家黨員和人口的比例（王奇生，2009，頁 296）。數量的有限、組織的弱小，反映國民黨在民眾中威信不高，引力不大。

國民黨的黨員品質更差。國民黨接納黨員程序混亂，以致成員魚龍混雜，諸如土豪劣紳、貪官汙吏、投機分子等大量素質低下之人混跡其中。《大公報》社評寫道：「國民黨自執政以來，黨員未必加增，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各地辦黨務之人，得意者亦腐化，失意者亦消極（〈論保障政治自由之亟務〉，1932 年 4 月 30 日）」。有報紙還指出，國民黨黨員中存在嚴重「四化」，即腐化、惡化、軟化和消極化。「黨員的數量和品質直接關係到政黨『黨力』的強弱」（王奇生，2009，頁 293），在「質」和「量」上皆有問題的國民黨，其統治的弱勢不言而喻。

政黨組織強度還有賴內部組織結構的嚴密性、協調性以及運作的有效性。國民黨內的地方組織基礎非常薄弱，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的第

六年，只有不到 40% 的省份、不到 17% 的縣成立了正式的省、縣黨部（王奇生，2009，頁 301）。城市有黨、鄉村無黨，也是其突出特點。更為嚴重的是，基層組織黨紀缺失、形同虛設，蔣介石（1984，頁 524）對此嚴厲批評：「雖然規模粗具，事實上仍是一個空架子，沒有任何組織紀律和組織活動，毫無功效可言。平時不能訓練黨員，徒然有一黨部，有什麼用處呢？」。

與此同時，國民黨內各個派系始終紛爭不斷，形成巨大內耗，大量資源浪費在派系爭鬥上。力行社與 CC 系之爭、三青團與國民黨本黨之爭，直到最後瓜分權力的六大派系鬥爭之公開化和激烈化，使得國民黨內出現嚴重的組織危機。「一個政黨建立後，要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秩序，首先要有一個強大政黨組織力量的支撐」，這是「近代以來世界強權政治的經驗」（王奇生，2010，頁 51），而國民黨作為一個內部已經潰爛、毫無凝聚力的政黨組織，本身就喪失了生命力。

黨治力度主要表現在黨員對政治資源的控制程度和社會動員能力兩方面。首先看國民黨員對政治資源的控制程度。一黨專政體制下，入黨應是入仕的先決條件。考量國民黨的政治錄用機制，入黨並非從政的敲門磚。1929 年到 1930 年，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核心地區的南京、上海兩市，政府公務員中黨員僅佔 10% 到 17%，縣政府機關黨員更少。

黨員對政治資源的控制遠遠未達到獨佔壟斷的地位，非黨員佔據相當比例。黨籍有無對個人升遷也不重要，軍統頭子戴笠就不是國民黨員，黨員在政治地位和晉升機會上也沒有明顯或潛在的優勢。因此，黨員對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為消減，甚至對黨的生死存亡也漠不關心，國民黨黨治的脆弱性可見一斑。

由於黨員對政治資源有限佔有，也導致「以黨制政」在實際運作中的失效。國民黨沒有真正做到以黨制政，政權旁落於官僚之手，政府早

已與黨脫離關係，黨失去統馭政府的權力和尊嚴。尤其在地方一級，各省黨部完全成了政府的尾巴，不是黨部指導政府，而是政府左右黨部（王奇生，1999）。正如國民黨黨報上海《民國日報》（1930年8月29日）所言：「在黨治下之政治機關，黨員人數如此少數，實有失黨治之精神」（王奇生，2000）。

其次看國民黨的社會動員能力，有足夠的能力動員多數國民支持其政治目標是一個強大政黨的特徵之一，由於國民黨採取「不要民眾」的做法，使其自身完全脫離民眾，最終導致其幾乎沒有社會動員的意識，完全喪失社會動員能力。

在價值維度上，執政黨統治力的強弱主要表現為政權合法性。這裏所說的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指的是社會秩序和權威被自覺認可和服從的性質和狀態」（俞可平，2012，頁2）。對於執政黨而言，被人們自覺認可和服從的程度越高，其合法性越大，執政統治力就越強，國家「善治的程度便越高」（俞可平，2012，頁2）。

一個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主要基於規則和民意兩個方面，其中規則提供的是統治的神聖性；民意及政權的獲得必須取得權力之源，即人民的信賴和認同（王海洲，2008，頁7-10）。下面從這兩個層面考量國民黨政權在價值維度上的強弱。

首先從「規則」上考察。規則是由意識形態等要素構成的價值系統。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和治國綱領是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然而國民黨在對待孫中山遺教上存在嚴重隨意性，蔣介石取得政權後對「三民主義」做出一系列牽強附會的解釋，³使其喪失應有的嚴肅性和內在規定性，因而不能獲得意識形態統治權。

其次從「民意」上考察。南京政府時期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國民黨

在黨員心中缺乏信任感，黨員在社會上缺乏聲譽感，黨國在黨員和民眾中缺乏公信力和認同感。在國民黨經過 1927 年至 1928 年清黨運動後，這一點表現尤為突出，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仰可謂一落千丈。「民國十七年以後，黨與黨員的關係日益疏遠，黨在社會上的地位便日益低落，低落到使每一個黨員不敢在群眾之前暴露他的面目，低落到使社會上一般潔身自愛的人，聽到黨這個名詞便生厭倦」（王奇生，1999）。國民黨既缺乏意識形態權威性，制定的政策和法律又未能贏得黨員和民眾的政治認同，這些都使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大為減弱，統治駕馭力大為削弱。

由於集權和專制的弱勢，它對新聞業的控制，無論是政治控制、經濟控制還是法律控制都是有限的，這就為新聞業尤其是民營新聞業留下一定的生長空間。同時，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在其羽翼未豐的情況下，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民營報刊樹立其權威性以取得其合法性，這也有利於民營報刊的發展。

下面，我們從媒介生態學的視角，具體分析一下此時期報刊的生態位。

貳、報刊的生態位分析

一、報刊的生態位狀態描述

在媒介生態學中，生態位是指不同媒介群落和各個體媒介在媒介大系統中的所處位置。「媒介生態」中的「媒介」不是個別的，孤立的，是由許多媒介個體和眾多媒介群落不斷競合所組成的統一整體。媒介基於生存或者生長，需要適量的生存或者生長資源，而在特定時空中的媒

介生存環境所能提供的媒介生存資源是一定的，所以，任何媒介個體和媒介群落的生存將面臨需求量的無限性與生存環境提供資源的有限性這對永久矛盾。於是，出現媒介群落和媒介個體之間為了生存而爭取生存資源的競合，如此出現「優勝劣汰」，其核心是媒介在生存環境中能夠佔有生存資源的方式與寬度，媒介「佔有生存資源的方式與寬度」不同，就形成一定的「媒介生態位」（niche）；媒介生態位是變動不居的，「優勝劣汰」的問題不可能一勞永逸（陽海洪、趙平喜，2009）。

首先要肯定的是，南京政府前十年，中國的媒介生態圖還是五彩繽紛的，其中有不同性質的媒體群落和媒介個體。僅就報刊群落講，有黨報群落、商業報刊群落、自由主義報刊群落，黨報群落主要有國民黨黨報群落和共產黨黨報群落。國民黨黨報又包括「黨報」、「半黨報」、「準黨報」三種。⁴當然也必須看到，這些不同報刊群落由於它們從外界吸取的資源多寡不同，其生長情況呈現出較大差異。

先看黨報群落。由於國民黨是一黨執政的執政黨，所以國民黨黨報群落獲取資源最多，生長規模最龐大。

與所有黨報對其創辦者有很強的依附性一樣，國民黨黨報系統的生長緊隨國民黨的變化而變化。在南京國民黨政府剛剛建立的日子裏，整個黨報系統包括最受重視的《中央日報》都面臨著十分困難的局面。作為最高級別的黨報，報社卻極為簡陋，「社址是租賃一破舊的二層樓民房」，「報紙篇幅日出兩大張，報社自聘的採訪記者只有一人」（賴光臨，1981，頁 123-124），頻頻出現稿荒。

隨著國民黨政權趨於穩定和經費充足，《中央日報》的事業也有很大發展。「在南京發行第三年，已有營業積存款項，購置二畝餘土地，興築大廈，並購捲筒印刷機，改進印刷設備」，以致「抗戰發生前，該報國內各地通訊網已規模粗具，國外有好幾處特派員，發行數將及三萬

份」(賴光臨, 1981, 頁 124), 一時成為南京大報之冠(方漢奇, 1996, 頁 379)。

國民黨黨報能夠從國民黨政府那裏獲取大量的補助資金、廣告資源、發行管道資源以及最即時可靠的資訊資源, 它們不用考慮市場生存問題, 毫無生計擔憂。這種優越的媒體生存環境, 使得國民黨黨報群落的發展極為迅速, 除中央機關報外, 遍佈全國各地的國民黨地方黨報也隨之創辦起來。據有關統計, 至 1934 年, 江蘇地區有報紙 255 種, 浙江有 79 種, 湖南有 57 種, 其中多半是國民黨黨報(復旦大學新聞系新聞史教研室, 1986, 頁 246)。到 1936 年底, 各級各類國民黨黨報達 600 家以上, 占全國報刊總數 1,468 家的 40.5% (蔡銘澤, 1998, 頁 4)。

國民黨其他新聞媒體和黨報一樣, 在資源獲取方面占盡一切優勢, 發展很快。據 1937 年 6 月統計, 國民黨統治地區共有官辦廣播電臺 23 座, 總發射功率 116 千瓦多(吳保豐, 1937), 其中中央廣播電臺在陳果夫的努力下急劇擴張, 發射功率達到亞洲之冠(方漢奇, 1996, 頁 380)。

中央通訊社不僅購置通訊社專用的無線電通訊電臺向全國播發電訊稿, 同時在全國各地甚至在海外的東京、新德里和日內瓦等地都設置特派員和通訊員辦事處, 大大擴張實力, 並收回外國通訊社在華發稿權, 同路透社、哈瓦斯社和合眾社簽訂互換新聞協議, 從而具有了國際新聞的壟斷特權, 迅速發展為國家通訊社。1932 年, 中央通訊社和中央日報改版並在全國建立分支機構, 中央日報、中央通訊社、中央廣播電臺加上國民黨軍隊報刊《掃蕩報》, 這四大傳媒系統很大程度地控制全國各地新聞界的資訊來源。

黨報群落中, 中共黨報也有一定的發展。這一時期中共的報刊分為

兩個部分，國統區和革命根據地。1927年「4·12」政變後，在國統區，共產黨組織及其報刊轉入地下狀態，生存空間微乎其微。作為「異黨」媒介，身份「非法」，與執政黨新聞媒體的生存空間和資源佔有相比，中共媒體幾近於零。

這種情況下出版的中共黨報如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論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1928年11月20日，1930年8月15日改為《紅旗日報》）等主要起黨內思想凝聚和組織聯絡的作用，還不是真正意義的大眾媒體。「左翼」刊物在對國民黨及其政府的反文化「圍剿」鬥爭中採取各種辦法堅持公開出版，贏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間，並在文學青年中產生一定的影響。

中共報刊在根據地獲取相應的生長空間。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成立後，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迅速創辦《紅色中華報》（1931年12月11日，1937年1月更名為《新中華報》）和「紅色中華通訊社」（1931年11月7日創辦，1937年1月更名為「新華社」）等。1933年下半年，中共領導工農紅軍先後在14個省的邊界地區開闢出十多塊革命根據地，出版一批地方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的報刊。然而，由於根據地多處偏遠農村，經濟文化落後，人力物力嚴重不足，外部還面臨國民黨封鎖，紙張、器材等資源緊缺，印刷、發行十分困難，生長狀態不算良好。

再看商業報刊群體。一方面由於國民黨對商業媒體的政策比較寬鬆，商業報刊存在較大的生長空間，另一方面由於國民黨黨報只是充當國民黨的喉舌，只是「為了政治宣傳的需要」，「讀者並不愛讀」（方漢奇，1996，頁373），所以，民營報紙有比較大的讀者市場。因而在此期間，其規模僅次於國民黨的報刊群落，尤其在上海、天津等幾個商業發達的大城市佔據明顯優勢。據統計，國統區1931年報紙的數量為

488 家，1937 年有 1,077 家，大部分為民營的商業報紙，並且有影響的大報均為民營商業報紙（吳廷俊，2008，頁 294）。

總體而言，在國民黨的新聞統制之下，儘管一些商業報刊由於觸犯到國民黨政府某些專制條款而遭到種種壓制，但仍有不小的發展空間，可以通過各種努力獲取所需的各方面資源，維繫報紙自身的生長。商業報刊的代表是《申報》、《新聞報》、《大公報》、《立報》等。

申、新兩張老牌商業性報紙堅持按企業方式經營報業，在市場競爭中求發展。在北洋時期發展的基礎上，到 1930 年，《新聞報》發行突破 15 萬，而《申報》也接近了 15 萬，創兩報發行頂峰（方漢奇，1996，頁 184）。1932 年後，《申報》改革，雖然招到政府嫉恨，但是發展勢頭不減。當時紙張、印刷設備等物質資源非常緊缺，《申報》卻可以通過市場獲取。

1926 年續刊出版的新記《大公報》提出並堅持「四不」辦報方針，發展勢頭強勁。該報幾次更新設備，擴大發展，報紙銷量節節高升。續刊時，該報日發行量不足兩千份，經過發展，1936 年 9 月發行數達十多萬份，附屬刊物《國聞週報》也發行兩萬多冊（吳廷俊，1994，頁 8）。一張破產的報紙續刊後很快地從天津走向華北，從華北走向全國，一躍成為一張極有影響的全國大報。

30 年代初，雄心勃勃的新聞事業家成舍我考察歐美新聞事業，對那裏的「便士報」印象極深，他於 1935 年 9 月 20 日創辦中國大眾報紙《立報》。這張「窮人的報紙」和「忙人的報紙」獲得很大成功，創刊不到半年，日銷量已超過 10 萬份，1937 年上海「八一三」抗戰時，日銷量達 20 萬份，創當時報紙銷量的最高紀錄。

自由主義報刊群落是一批知識份子，在國難當頭出於對民族命運的關切和對社會的公心而自發籌辦的獨立報刊。這一時期的自由主義報刊以

胡適發起的《新月月刊》（1928-1932）和《獨立評論》（1932-1937）最為典型，社會影響力也最大。這類報刊的特點是其獨立性：形式、精神和立場獨立。形式上為同人刊物，精神上的獨立思考，「我們叫這個刊物為《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胡適，1932a）。

保持體制外身份，站在無黨派立場，獨立發表意見，自由主義報刊發表的諸多文章很受讀者歡迎，在民眾中形成較強的輿論影響力，國民黨政府對其也比較重視。「九一八」事變之後，邀請一批自由知識份子到南京共商國是，胡適等被聘為國防設計委員會首批委員，自由主義報刊也因此獲得一定的生長資源和更大的生存空間。

概言之，多元報刊群落不均衡生長，這是南京政府前十年報刊的生態位基本狀況。

二、企業化運營及托拉斯發展

這一時期報刊的企業化運營既包括民營報刊在企業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現報業托拉斯，又包括國民黨黨營新聞媒體改制，向企業化經營管理體制邁進。

民營報刊的企業化經營。南京政府前十年，一些有影響的民營大報在北洋時期企業化經營的基礎上又有了進一步發展。其表現有以下幾點：

其一，制定完備的規章制度。現代化企業靠制度管理，完善的規章制度對於報紙企業化運營有重要價值。如此時的《大公報》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財務、分配、福利制度等。《大公報》

有著明確的職責分工，組織機構層次分明而不龐雜，出納、會計、發行、廣告等各自獨立，互不干涉，各個部門之間獨立處理問題。這些制度的確立與貫徹，保證了報紙的穩定有序運轉，奠定大公報的成功（刁蘇彬，2007）。

又如世界報系老闆成舍我借鑒西方先進的現代化管理經驗，對報社進行「企業化」經營與管理。他制定出嚴格的規章制度，獎罰分明，人、財、物得到有效監管，報社得以有機運行。

其二，重視廣告經營。廣告是報刊企業化生存財源之所繫，民營大報將廣告經營放在極為重要的地位。《申報》創立廣告科，開闢諸如廣告設計、廣告圖樣繪製等服務的廣告業務。《大公報》社講究廣告業務的技巧，針對續刊初期戲院和電影院不來登載廣告的情況，經理胡政之每晚派人到影劇院抄寫次日演出戲目，免費刊登三個月後再收取微薄費用。又為有效利用版面和吸引客戶，特將版面細化且分散的小廣告集中起來整合成業務分類廣告來降低廣告費用（賈海洋、衛俊、嶽謙厚，2011）。

成舍我在廣告售價上大做文章：「廣告標價實行浮動制，雖明碼標價，但兜售廣告時，不按定價收費，而依據價目打七折八扣，但當報紙銷售量增多時，價目一律照實收費」（陳陽，2007）。重視廣告經營，報紙上的廣告比例大大增加，為報館帶來利潤。

其三，革新報刊發行方式。報紙要發展，必須重視發行工作。《申報》館設立專門的推廣發行科，重視發行制度的改進與完善。發行科根據火車時刻表精心設計郵遞線路，擴大外地訂戶，經過努力，「外地的長期訂戶即達一萬多戶，後來外地銷數差不多占總銷數的一半，達七八萬份之多」（梁軍、肖瀟，2011）。在其發行的鼎盛期，即 15.59 萬發行量，「除上海 56,050 份外，江蘇 34,950 份，浙江 14,300 份，安徽

12,400 份，值得注意的是，相對偏遠的華北地區綏遠、察哈爾也各有 70-80 份，西藏 16 份」（湯耀國，2006 年 6 月 28 日）。

成舍我實行自主發行。《立報》在上海創辦後，報館自備 100 輛自行車，每天早晨直接把報紙送到訂戶手中，使讀者即時獲取當天的新聞，以低於批發給報販的價格，把報紙推向市場。

其四，開展多種經營業務，拓展報業的生存空間和品牌競爭力。《申報》除出版主打報紙之外，還擴張出版《星期增刊》、《常識增刊》、《汽車增刊》、《圖畫增刊》等相關刊物，出版各類圖書，佔領多個受眾群體市場；創辦「申報三校一館」⁵等進步文化事業，這些與《申報》的發展相輔相成，形成系統化的多元組合品牌產品，極大地提升報紙的整體競爭力。《大公報》也非常重視擴大經營範圍，營業部對外承印各種印件，成立「出版部」，出版各類書籍。

其五，注重人才優化配置。人才的優化配置是報社成為高效運行平臺的重要條件之一。《申報》老闆史量才聘任經營才能出眾的張竹平為經理，提拔精通廣告業務的年輕人汪英賓為廣告部主任協理。在總主筆陳冷、經理張竹平、協理汪英賓辭職之時，啟用張蘊和為總主筆，馬蔭良為經理，並成立總管理處，聘陶行知為總管理處顧問，黃炎培為設計部主任，戈公振副之，重新組建了一個人才配置極佳的新團隊。這支人才團隊對《申報》的發展功不可沒。

新記《大公報》十分注重人才培養，一旦發現人才，破格錄用，大膽使用，創造條件，讓他們迅速成長。當時，《大公報》的名記者，除了張季鸞、胡政之，還有曹毅冰、王芸生、徐鑄成、范長江、費彝民、蕭乾、王文彬、徐盈、李純青、孟秋江、彭子岡、李俠文等。這支出色記者隊伍的培養是《大公報》能在十年間迅速崛起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方漢奇，1996，頁 471）。

在企業化運營獲得巨大發展的基礎上，一些有理想的民營報人開始走向報業托拉斯的探索之路。在這條探索之路上，張竹平邁出了可貴的一步。1932 年，張竹平將《時事新報》、《大陸報》、《大晚報》等三報和「申時電訊社」聯合起來成立「四社」辦事處，實施聯合辦公，各自經營。「四社」的成立在當時的新聞界影響很大。像這樣一個既有報紙又有通訊社、既有日報又有晚報、既有中文報紙又有英文報紙的聯合體在中國新聞史上空前。同時，四家機構聯合起來，經濟實力相當雄厚。所以，當時就有人說，「四社」聯合是搞「報業托拉斯」，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報業集團化的一次有益嘗試。

國民黨新聞媒體的改制及其企業化經營。國民黨的黨營新聞業本來是在「黨化新聞業」的方針下建立起來，屬於非盈利性質，其人員配置和經費來源都在國民黨各級組織的直接領導下，從宣傳方針、人事管理、經費來源、組織紀律等各個方面受到國民黨的嚴格束縛。1932 年以前，國民黨新聞媒體「規模有限，經營不力，宣傳聲音微弱，各地的黨營新聞事業受到國民黨尚未轉變的整個宣傳方針的局限以及各地黨部的約束，更是單一刻板，不受歡迎」（方漢奇，1996，頁 363）。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民眾要求抗日救亡的呼聲越來越高漲，國民黨新聞方面的領導人感到原有的新聞機構，無論是規模設備、管理方式還是領導體制，都很不適應。為了改變這種狀況，1932 年，國民黨決定對黨報進行改制，對黨報的組織形式、人事制度、經費來源、財務管理等方面重新規定。

關於組織形式，規定「凡直轄報社均歸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管理監督；直轄報社設社長一人綜理全社事務，由中央委員會任用，呈報中央常務委員會備案；社長之下分設經理、編輯兩部，各設主任一人分理該部事務，由社長呈請中央宣傳委員會任用，社長得兼任一部主

任」（中央宣傳委員會直轄報社組織通則，1932；轉引自蔡銘澤，1995）。社長負責制的確立，使黨報初步具備了獨立的法人資格，人事權歸於統一。

關於經費來源，規定「凡本黨黨員主辦之日報或期刊，均可請求本黨中央或各級黨部補助經費；非直轄報社，以該報之營業收入充之，不足時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或由中央決定令當地政府給予津貼」（中央宣傳委員會直轄報社管理規則，1932；轉引自蔡銘澤，1995）。國民黨黨報的經費開始強調營業，報社不單單作為黨部的附屬機構，企業性增強了。關於黨報的財務管理，規定：「直轄報社採用報社財務會計獨立制，會計員由中央宣傳委員會委派，受社長之指導，辦事會計事宜」，獨立會計制度的確立，既可加強報社內部的營業管理，也促使報社走向市場，參與競爭（蔡銘澤，1995）。

1932年春，《中央日報》在社長程滄波的領導下實施改制。程滄波明確提出「經營企業化」的理念，淡化黨報面孔，改變新聞機構作為國民黨黨部附屬物的形象，走上相對獨立的發展道路。

「中央社」在蕭同茲的帶領下也進行了企業化的改革。蕭同茲擔任「中央社」社長後立即遷出中央黨部，對外獨立經營，並且行使獨立發稿權（以新聞為本位，發稿不受干預）、用人自主權（用人唯賢，工作人員由社遴選）。同時，蕭同茲將他的辦社方針解釋為「經營企業化」、「工作專業化」、「業務社會化」，把企業經營放在首位。

社長負責制，獨立法人地位，獨立經營權、發稿權和用人權，獨立成本核算制度和會計制度，為今後國民黨黨媒進一步企業化打下基礎。

概言之，在這一時期，企業化運作是新聞媒體發展的一個亮點。民營報刊的企業化運作並開始邁進集團化發展道路是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國民黨黨營媒體企業化是國民黨當局對黨營新聞業改進

的重要步驟。雖然，國民黨黨營媒體在企業化道路上僅僅只是邁出了一步，但是這一步是難能可貴的。

參、自由還可爭取，報刊尚能干政

一、新聞自由，還可爭取

南京政府時期，國家的新聞自由面臨幾組矛盾形勢的規約。一方面，一黨專政的「黨國」不允許有新聞自由，另一方面國民黨南京政府羽翼未豐，立足未穩，要借助輿論界。尤其是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還採取若干「寬容政策」，煞有介事地通電說要開放言禁，也召開記者會表示歡迎報界的「善意批評」，似乎給報界一絲希望。一方面，新軍閥割據，局勢瞬息萬變，詭譎莫測，「軍爺們」價值觀不同，心情早晚有變，報界莫衷一是，新聞自由大小取決於軍爺們心情好壞。另一方面，軍爺們對自己地盤中的事不容許說「不」，但是對於他人，尤其是對手地盤的事，則可以直攻其非，這給報刊提供了「異地監督」的機會。

以上幾組矛盾形勢規約下，報刊對新聞自由不是完全絕望，而是還有幾分希望，不是完全無所作為，而是可以通過鬥爭爭取到自由，哪怕是很少的一點。

民間報紙和報人規勸當權者放開言論自由。報紙指出，「中國政界有力者……抹殺獨立言論界之存在……是根本錯誤的。……應該承認言論界有主張批評之自由。言論自由內容，即主張批評之自由，此在任何政體下，皆相當存在。……政見之批評，則任何時代，皆應為完全自由之事也」（張季鸞，1930 年 4 月 26 日）。

言論自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禁錮言論自由絕無可能，「夫所謂言論出版自由，就法律立場而觀之，則有其絕對之神聖，為任何人任何勢力所不能侵犯。舉國民之思想言論行為而加以禁錮，則不僅在理論上為不可，而在事實上亦絕不能」（〈言論自由之真義〉，1931年12月13日）。而站在維護當局統治的立場上，也應給予言論自由，因為「表達思想言論的自由，是培植優良政府的必須條件」，政府權力愈是集中，公共批評就愈要有力，當局「如果能虛心接受全國各部分善意的批評，公開與國人討論，則上下便能受到互助互利的效果」（陳之邁，1935）。因此，《大公報》提出「獎勵言論自由愈早，所減除社會危機愈多，故於黨國利益愈大」（張季鸞，1929年12月29日）。

大膽抨擊黨國箝制媒體的新聞政策。「國民黨執政以還，摧殘言論，壓迫報界，成為一時風氣，方法之巧，干涉之酷，軍閥時代，絕對不能夢見」（〈報紙如何可以為民眾說話〉，1930年7月15日），「近年政治上最大之失著，為錮閉思想，干涉言論，以致士氣消沉，人心萎靡。當局者但求一時的耳根清淨，而不知影響所及，得不償失」（〈言論自由與立言之態度〉，1930年7月24日）。《大公報》直接告誡當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當局「完全置全國言論界於黨部指導管理之下」的新聞統制只會導致「人民神經久而麻痹」，報紙失去信用。

在「言論創作的自由被壓縮得同針頭那麼纖細」的年代，試圖保持獨立發言地位的報紙對國民黨苛細酷虐的新聞政策及其對新聞檢查制度的濫用表示強烈不滿：「須知立法之目的，重在指示，不重在箝制，若當局持吹毛求疵之態度，則中國永無言論自由可言」（張季鸞，1937年2月18日）。針對當局「蒙頭蓋面」的「統制新聞政策」，張季鸞接連發表〈今後之大公報〉、〈改善取締新聞之建議〉、〈論統制新

聞〉等社評，與國民黨新聞檢查制度正面碰撞。

面對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專制，報刊界一方面再三呼籲政府放寬言論統制尺度，改善輿論環境，另一方面奮起進行爭取新聞自由的鬥爭。報刊界經常以集體和組織的方式對國民政府的高壓控制予以抗議。成都報業聯合會、上海書業總會、上海日報公會、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組織，抗議國民黨對言論自由的侵害，呼籲新聞界同人並肩為爭取結社、言論、出版、集會等民主自由權利而鬥爭。一些報刊採取「迂迴戰術」，報館被查封後另起爐灶，更名重來。⁶

鬥爭是艱苦的。《民生報》因公開揭露國民黨行政院處長彭學沛貪汙舞弊，被南京新聞檢查機構刪扣；《申報》由於言論批評激怒當權者，被「禁止郵送」；國民黨當局以「言論反動，誹謗黨國」罪名禁止《生活》的郵寄；《獨立評論》也一度遭到停刊。更有甚者，《申報》老闆史量才堅持獨立報格，拒絕蔣介石派員「指導」等，最後遭到暗殺。

雖然如此，鬥爭是有成效的。1929 年 7 月 2 日，蘇州市全部 11 家報紙集體停刊，抗議黨政軍聯合檢查處隨意刪除新聞的行為，「聯合新聞檢查處」撤銷，新聞界剔除了新聞自由的一個絆腳石，大大拓展新聞自由的空間。

在《大公報》等報刊爭取自由的輿論抗爭下，蔣介石發出「《大公報》並轉全國各報館」通電，表示開放「言禁」，歡迎報界對國民黨政府一切「弊病所在，盡情批評」（大公報，1929 年 11 月 29 日）。雖然不久之後當局又繼續收緊言論管制，但它無疑為新聞界的言論自由提供了又一個合法的官方依據和一定的自由空間。

1933 年 1 月，《江聲日報》經理兼主編劉煜生被國民黨江蘇省政府殺害。此事件引起新聞界震動，在強大的聲勢下，南京國民政府於

1933年9月1日頒佈〈保護新聞從業人員及保護輿論機關的通令〉，訓示各級政府及軍人「對於新聞從業人員，一體切實保護」。這個〈通令〉成為當時新聞工作者爭取新聞自由的工具。1934年8月，杭州記者公會向全國新聞界發出通電，倡議定9月1日為記者節，得到不少地方的回應。從1935年開始，「九一記者節」得到全國新聞界的承認。「九一記者節」來之不易，是中國新聞記者自己爭取到自由的標誌性成果。

縱觀整個南京國民政府前十年的報刊界，仍有幾分新聞自由。當然不同報刊群落的新聞自由程度有所不同。本研究選取《中央日報》、《大公報》和《申報》三份報紙，對其1928年至1937年的言論欄目進行內容分析，使用「星期合成法」進行抽樣，即從每年的第一周抽取星期一，第二周抽取星期二，以此類推，抽滿一周再重新從星期一開始迴圈抽取。⁷

「對政府和官員的新聞批評的限度」是衡量新聞自由程度的重要標準（威廉·裏沃斯／高鋼譯，1986），故本研究以其言論對南京國民政府及其官員的立場態度為測量指標，主要觀察報刊能否批評政治主張、政治制度、政治行為和政治人物，將「立場態度」分為「批評」、「中立」、「讚揚」和「無關」（無關乎對政府及其官員的立場態度）四個類目。

表一：1928-1937 年三份報紙的言論欄目統計表

欄目態度	批評	中立	讚揚	無關	總計
《中央日報》「社評」	15 6.3%	36 15.2%	115 48.5%	71 30.0%	237 100%
《大公報》「社論」	187 39.8%	43 9.2%	58 12.3%	182 38.7%	470 100%
《申報》「時評」	136 29.1%	65 14.0%	17 3.6%	249 53.3%	467 100%
欄目總數統計	338 28.8%	144 12.3%	190 16.2%	502 42.7%	1,174 100%

通過統計我們發現：1928 年至 1937 年《中央日報》「社評」欄目基本以「讚揚」的立場態度為主，占了將近一半的比重（48.5%）。這與該報的屬性和宗旨完全一致，同時我們也看到它在國民黨意識形態統領下仍能保持少量的批評言論（占 6.3%），只不過這些批評言論基本上是站在中央政府立場批評地方政府及其官員。

1928 年至 1937 年《大公報》「社論」欄目中，對政府及其官員持「批評」態度的社論占了最高比重（39.8%），而持「讚揚」態度的僅占 12.3%。《大公報》作為當時卓有影響力的高端商業性報紙最大程度地踐行了媒介的新聞自由，同時也看到無關乎政府及其官員立場態度的社論占了較高比例（38.7%），這與當時國難堪危的背景有關。《大公報》深深憂慮國家與民族的安危，較多關注和評論國際時局尤其是日本局勢等關乎我國安危的事態與動向，其他報紙也皆有類似的表現。

在 1928 年至 1937 年《申報》「時評」欄目中，無關乎政府及其官員立場態度的時評占了所有時評的極高比重（53.3%），由於十分關注國際時局尤其是中日局勢，《申報》在此方面傾注了更多精力。除此之外，依然是持「批評」態度的時評占較高比重（29.1%），而對政府及其官員持「讚揚」態度的時評僅占很小比重（3.6%）。《申報》作為企

業化經營的老牌商業報紙，它一方面將很大精力傾注於民族安危上面，另一方面也始終堅守著自身所擔負的批評監督政府的媒介職責。

對三份報紙的言論欄目進行比較，《大公報》的批評言論所占比重是三份報紙裏最高的（39.8%），《申報》的批評言論比重（29.1%）明顯低於《大公報》，兩者相差 10.7%，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追求「公」利的《大公報》比追求「商」利的《申報》更為重視並踐行對政府的批評監督。

《中央日報》在三份報紙中批評言論比重最小（6.3%）。因此，商業性報紙的批評言論遠遠超過國民黨黨報，他們更好地發揮批評監督政府及官員的媒介職能，同時唯有如此方能爭取廣大的讀者市場，實現其商業化生存，這種媒介生存方式恰恰客觀上促使它們保持較高的言論自由度。相反地，黨報作為國民黨政府的宣傳喉舌主要依託黨政供給來維繫生存，其職在「宣傳」而非「批評」，這樣其言論自由度也就非常有限。

另外，我們通過這三份報紙言論總數的統計發現，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批評」言論佔據言論總數的比重達 28.8%，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民黨政府時期大致的言論自由狀況，總體而言當時的報刊擁有一定的新聞自由和適度的話語空間。

此外，雖然《中央日報》言論欄目充滿強烈的意識形態味道，新聞報導也淪為國民政府當局的政治傳聲筒，但是，其副刊呈現出與其正報完全不同的面貌，成為一種特殊的媒介自由形態。

南京國民政府前十年，《中央日報》兩個副刊《青白》、《大道》在王平陵的主持下採取淡化黨派色彩的編輯手法，帶有一種真誠的探索氣質和個人化色彩，客觀上拓展了容納不同聲音的範圍，使之與當時的文壇產生一定程度的正面互動（趙麗華，2012，頁 52、74）。

這種表現就多多少少構成對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偏離，在黨義宣傳和黨治文藝的總體政治框架下爭得了一些自由的話語空間。尤其是 1932 年程滄波接替葉楚傖任社長後，著力改革，《中央日報》副刊也變得更為豐富，從 1932 年到 1937 年，該報主要副刊《中央公園》和《中央日報副刊》皆由儲安平任主要編輯或單獨編輯。儲安平作為初具自由主義思想的年輕知識份子，在其主持下，《中央公園》更多呈現著新文藝界的動態，《中央日報副刊》則緊貼社會熱點問題和思想界最新話題，保持著一種活潑、直接的現實觀照，與《中央日報》整體的保守氛圍形成反差，表現出一定的開放性和自由度（趙麗華，2012，頁 138）。儲安平一方面特約名家撰寫專論或選載《獨立評論》、《大公報》等刊物的文章，另一方面組織話題討論，試圖營造出一個知識份子自由對話的「公共論壇」。

儲安平在向讀者徵稿時就提出非常歡迎對新近發生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種問題能夠另有一種意見並提出討論者，希望《中央日報副刊》成為「公共的喉舌」，《中央日報副刊》關於「士與救國」、「服從領袖」等討論充滿了公共精神和批判色彩。

《中央日報》的副刊能有如此新鮮的氣象實屬不易，這一方面是由於副刊本身屬性具有的相對開放性，但更多地反映出國民黨自身人才的缺乏，因此拉攏中間派作家就成為國民黨規劃黨治文藝時所實行的重要策略。正是這種特殊狀態使得儲安平等非黨內人士得以介入黨報副刊的生產，從而在《中央日報》開創出最大程度的自由話語空間，這也構成南京國民政府前十年報刊言論自由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二、報刊干政，有所作為

一般來說，干政是新聞媒體的主要功能之一。能不能干政，干政有沒有效果，是衡量一個國家新聞媒體健康發展的重要標準之一。媒體干政的常規操作是通過新聞報導、政論文章關注並影響政治方向和政府決策。

一個國家的報紙「過分嚴整的宣傳」有兩種弊端，「一方面使得人民神經久而麻痹，反使宣傳失效；二是報紙專為政府作宣傳機構，全國輿論單調化，根本上使人民失掉讀報的興味，最後足以使報紙失去作用，前者不利於政府，後者不利於報紙」（張季鸞，1929年12月29日）。為國家利益著想，報紙對政府應該有所批評，假使批評為難，則幫助時也就乏力（吳廷俊，2002，頁361）。

在張季鸞和《大公報》看來，報紙要發揮作用，必須有與政府不同政見發表，輿論必須多元化；對政府的現行政策必須有所批評，對政府的現任官員必須有所監督。南京政府前十年，報刊的干政主要在發表不同政見、直接批評監督這兩個層面上展開。

從1928年到抗戰爆發前，《大公報》發言的一個重心是呼籲開放黨禁，廢止內戰，團結一致，加緊建設，增強國力。《大公報》指出，1928年後，國家統一，正是建設的大好時機，但是「因黨內自裂，啟連年戰禍，國力本微，又自斷之」。故在新政府建立後，中國「乃寸步未進，所增者，惟國民負擔」，希望當局對此進行反省。

此後，《大公報》不斷發表社評，用輿論敦促政府趕緊進行經濟建設。此外，《大公報》在1931年就計畫邀請全國最高知識權威為報紙撰稿，為建國大業出謀劃策。經過兩年多的準備，1934年伊始，〈星

期論文〉專欄在要聞版顯著位置正式設置。原計畫邀請丁文江、胡適等八位先生撰稿，後不斷擴大，至 1949 年 6 月，共有兩百多人發表七百五十餘篇〈星期論文〉，對形成社會輿論、干預政府決策方面發揮重大作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蔣介石大舉進攻蘇區「剿匪」之際，《大公報》卻公開提出「與其言剿匪，尚不如言討貪」的觀點，認為當下主要問題是官吏風氣太惡，一切禍源皆由此產生。希望政府在全國「懲治一萬貪汙文武官員」，以紓緩財政，解決民困（〈剿匪要義〉，1932 年 6 月 19 日）。

在蔣介石揚言反共，消滅「赤禍」時，《大公報》卻提出「學習蘇俄建設經驗」。在《大公報》看來，蘇俄政治體制不好，但是建設國家的經驗值得學習。在蘇聯十月革命 15 周年之際，《大公報》於 1932 年 11 月 7 日發表題為〈蘇聯十五年〉的社評，歌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蘇聯人民艱苦建國的精神，次日又發表社評，向政府和社會各界提出建議，「組織赴蘇俄視察團」，對蘇俄的社會作實地考察。

自由主義時政週刊更是如此。這類報刊創辦的唯一目的就是干政，如胡適所言，他就是利用現實政治風暴機緣聚集一批自由知識份子，組織成「一個可以監督政府指導政府並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團體」（胡適，1932b），以報刊為陣地切切實實做點干政的事情。「胡適留美期間醉心於《新共和》，回國以後便即仿效它的風格辦同人雜誌，積極對國事發表各種主張」（李金銓，2011，頁 55）。

《新月》創刊後，成為討論政治的著名論壇，胡適等人在 1929 年和 1930 年間掀起一場生如閃電的「人權運動」——那些酣暢淋漓的雄文，徑直指向國民黨一黨專制的中心（吳麟，2010，頁 39）。〈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有憲法〉、〈知難行不易〉等文，對國

民黨政權藐視人權、以訓政之名行專制之實的陰暗行徑進行猛烈抨擊；〈專家政治〉、〈論人權〉、〈高壓迫言論自由者〉、〈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對「黨天下」的局面進行淋漓盡致的批判。

《獨立評論》承接《新月》主張，不斷發表文章以監督和推動政府的改革，討論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民生、教育改革、法治、軍事等，對國民黨政府提出尖銳批評：說空話、貪汙和無視人權；國民黨的「無能」、「無知」和「胡鬧」（張太原，2006）。

即使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申報》亦如此。1932年6月，國民黨政府在抗日危急的情況下仍然發動60萬大軍對共產黨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次圍剿，《申報》對此進行嚴厲抨擊，分別於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連續發表〈論剿匪與造匪〉、〈再論剿匪與造匪〉和〈三論剿匪與造匪〉等三篇時評，直截了當地批評國民黨政府政治黑暗和治國無方導致民生不安和社會混亂。

報刊干政效果如何？從當時實際情況看，還是有效果的。這主要表現在干政報人和報紙越來越受到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尊重和重視。

蔣介石多次邀請《大公報》領導人座談，當面聽取意見和建議。1932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牯嶺約見《大公報》社長吳鼎昌，吳在廬山住一周，與蔣多次晤談。蔣對吳的觀點十分賞識；抗戰爆發前，張季鸞三次上廬山面諫蔣介石，對蔣介石在幾個重大問題決策產生一定影響。⁸

1934年，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大宴群臣，張季鸞作為《大公報》總編輯應邀出席，被安排在賓客席首席位置上，蔣介石頻頻為張敬酒，口口聲聲恭稱他為「張先生」，視之為「國士」。從此往後，兩人攜手，共赴國難。

1937年3月，張季鸞在上海做50大壽，蔣介石致電：「先生文章

報國，譽滿天下，屆茲五十初度，希望益完偉業，指導國家，完成復興」。實踐證明，蔣介石不僅是說說，而是付諸實際，資料顯示，直到 1941 年張季鸞病逝，蔣介石對他一直是優禮有加，待之以「國士」，幾次相邀，共商「建國大計」。

胡適從美國回國後，發表幾篇文章，⁹ 從保障人權的角度對孫中山的「訓政」思想和當局的「訓政」做法提出質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以「侮辱本黨總理，詆毀本黨主義，背叛國民政府，陰謀煽惑民眾」為由，要求中央拿辦胡適，蔣介石雖然給胡適扣上「反黨」的帽子，但是對他不僅採取「優容」態度，還「企圖接過胡適等人的口號，召集國民會議，制定約法」，只是因為胡漢民極力反對，才沒有成功。

此後，蔣介石與胡適經常見面，在一起討論哲學、教育等問題，胡適發現，蔣介石在不知不覺中接受自己的一些觀點。在蔣介石來看，他能夠結交胡適這樣的諍友，接受對方批評和諷諫，也是難得的事。這一時期，南京國民政府實行「專才治國」策略，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後，還邀請一批自由知識份子到南京共商國是，胡適、丁文江、翁文灝、蔣夢麟、周炳琳均為國民黨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首批委員。

同時，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對「罵」自己的干政報刊至少在表面是容忍的，甚至是欣賞的。蔣介石每天必看《大公報》，在他辦公室、公館、餐廳各放一份《大公報》，此習慣堅持數年不變。1931 年 5 月 2 日，在紀念《大公報》發行一萬號時，蔣介石送來親筆題寫的「收穫與耕耘」賀詞，稱該報「改組以來，賴今社中諸君之不斷努力。聲光蔚起，大改昔觀，曾不五年，一躍而為中國第一流之新聞紙」。

胡適時常向國民黨要人贈寄自己辦的雜誌，《新月》和《獨立評論》確實對南京國民政府有不少正面的影響。尤其是對教育政策的制定、實施，對拉近北方學人與南京國民政權的距離產生一定影響（張太

原，2008，頁 141），甚至在政府大政方針制定上都產生一定的影響。蘇雪林 1936 年 11 月 18 日致胡適的信中寫道：「《獨評》持論穩健，態度和平，年來對於中國內政外交貢獻了許多可貴的意見。近年經濟文化的建設，日有成功，政治漸上軌道，國際輿論也有轉移，我敢說《獨評》盡了最大推動的力量」（蘇雪林，1979，頁 325-326）。

此時期報刊干政之所以取得一定效果，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所致，除了國民黨專制弱勢和政府建設需要這一客觀原因外，從干政者自身層面而言，當時報刊界、文化界的一些精英群體與政府要員的密切交往所形成的精英權勢網路也是一個關鍵因素，這種精英權勢網路為媒體干政提供一定的基礎和保障。

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以胡適為首的「胡適派學人群」和張季鸞為首的《大公報》報人群體上。

以胡適為首的一批自由知識份子聚集起來組成「胡適派學人群」中很多知識精英不僅具有著社會文化領導階層身份，而且他們在學術圈以外擁有綿密的政府關係，如歐美同學會就為他們提供了與政治權力階層密切溝通的良好管道，同時與僅有的一些學術基金會如中基會及英庚款委員會保持密切的聯繫，在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的雙向互動中使其「權勢網路」得到不斷拓展（章清，2004，頁 110）。

最初是國民黨各方勢力如戴季陶、宋子文、李宗仁、唐生智等黨政軍要人向胡適頻頻拋出橄欖枝，尤其是胡適與宋子文交往密切，實際上早在留美期間二人同任《留美學生季刊》編輯就已經為日後雙方的政治溝通打下基礎。1929 年 7 月 2 日胡適應邀到宋子文宅邸長談改革意見，以後兩人關係更為密切。

與宋子文的交往給胡適辦的報刊帶來很大益處，如《新月》因言論遇到麻煩時，胡適即通過宋子文出面疏通。發生羅隆基被捕一事時，胡

適當即致電宋子文，宋馬上派出次長張詠霓出具保函進行保釋。到胡適北上辦起《獨立評論》時，「胡適派學人群」的幕後活動進入了全方位交往期，相應建構起直通最高當局的「權勢網路」（章清，2004，頁340-341）。胡適曾與蔣介石進行過多次晤談，在胡蔣的政治交往中雖摩擦不斷，但從未公開決裂，蔣介石深知胡適背後有美國力量的支撐，而蔣正需要倚重美國（陳漱渝，2011）。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汪精衛與胡適的交往，汪精衛 1932 年就任行政院長後頻頻示意希望「胡適派學人群」中人到政府擔任要職。汪還特意帶給胡適一個密碼電本以方便兩人聯繫。「胡適派學人群」通過致電、書信與面談的方式頻頻與上層接觸，建立起穩固的政治交往關係，尤其是「胡適派學人群」中羅文幹與王世杰分別出長外部和教部也大大方便他們與上層的深度交往，以及「權勢網路」愈益拓展（章清，2004，頁347）。正是如此複雜的「權勢網路」為其所辦報刊保駕護航，從而擁有了一般報刊所不能比擬的言論空間和干政效果。

張季鸞為首的《大公報》報人群體同樣在國民黨政府時期與黨政要人之間形成明顯的權勢關係，使該報能夠最大限度的發揮干政作用。留學日本當年，張季鸞的學識和文筆在東京留日學生中頗有盛名，據說當時留學日本的蔣介石也深深佩服，這為張季鸞與蔣介石日後發展私人關係不能說沒有作用。

1928 年 6 月 22 日，張季鸞到河南輝縣百泉採訪民國宿將馮玉祥，得知蔣介石沿京漢路專車北上，張與馮趕到鄭州迎接，恰遇與蔣同行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邵力子、秘書陳布雷和總參議張群。邵、陳是張季鸞的至交，張群則是他留日時就熟識的老朋友。經馮、張、邵、陳的介紹，張季鸞與蔣介石「悅然面晤」，自此兩人開始長期的深入交往，並由此使得眾多政府要員對張季鸞和《大公報》刮目相看。

中原大戰前夕，蔣介石特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電全國各家報館發出求言詔書，電文抬頭為「大公報並轉全國各報館鈞鑒」，一舉將《大公報》推為全國輿論權威中心（田斌，2004）。吳鼎昌作為《大公報》早期的核心人物之一，1935年進入人才內閣，任實業部長（吳廷俊，1994，頁120-122）。這客觀上為《大公報》的言論干政提供了又一層政治屏障。報人轉而出掌政界，必然與報紙有著難以割捨的潛在聯繫，這在無形中助長報紙的干政效果。

此外，以胡適為首的「胡適派學人群」和張季鸞為首的《大公報》報人群體還曾通過《大公報》「星期論文」的平臺進行合作，由胡適安排《大公報》社外的作家每星期為《大公報》寫一篇文章（許紀霖，2007）。這樣兩大「干政」群體相互倚重形成一股合力，大大拓展了話語空間，增強言論的干政力量。

肆、結語

雖然執政黨的報刊在資源獲取上佔有絕對優先權，但是民營報刊還有相當的生長空間，爭取到一定的生長資源，致使這一時期報刊生長和發展呈多元狀態。這一時期，報刊增長不僅只是數量的增加，而且是報刊業現代性因素的增加。

國民黨試圖「黨化新聞界」，其四大傳媒系統掌控全國主要新聞來源，書報檢查橫行，甚至直接採取暴力打擊，企圖完全褫奪報刊的新聞自由權利。事實上，封報捉人的現象時有發生，但是專制的弱勢使得它「心有餘而力不足」，對報刊業控制不能做到「天衣無縫」，報紙和報人能經過艱苦鬥爭爭取到幾分新聞自由。

爭取到的新聞自由哪怕是極有限的，也能使新聞界顯示出幾分活

力。報刊能夠利用自己爭取到的言論自由，依法對政府進行輿論監督；同時，當局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對一些干政報人尚能「禮賢下士」，對報刊的「罵」尚有一定的容忍度，對干政主張還能有選擇性的接受和採納。

基於媒體生態學的視角，考量一個民族國家新聞事業正常發展的三個標準為：多元生長，獨立生存，依法運行（吳廷俊，2013，頁 42）。據此來看，南京政府前十年報刊的生長和發展，雖然離正常狀態尚有一定距離，但是，在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上還算是比較好的一個時期。

注釋

- 1 1927 年 4 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國家進入相對統一的局面，社會各方面均獲得發展，在相對統一的環境，有助於我們對其時的報刊生態進行全方位的考察。而 1937 年 7 月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階段，政府對報刊業的管制成為一種應然狀態。
- 2 1929 年 3 月，南京國民政府僅控制了 8% 的國土和 20% 的人口，到 1937 年抗戰前夕，它也只能對中國 25% 的地區和 66% 的人口實行有效統治。此外，政府內部，各派之間面和心不合，政治上的明爭暗鬥到軍事上的兵戎相見時有發生。
- 3 1939 年 5 月 7 日，蔣介石在中央訓練團演講時在比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後說，「我們總理所創造的三民主義」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主義。「它以『公』字為出發點，所以能涵蓋一切，把各方面皆行均衡顧到，無絲毫偏頗之弊，它的目的，是要使全國人民無階級、男女、職業、宗教之別，一律平等，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並且還要進一步本著互助合作的精神，以謀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而躋世界於大同。再具體的說來，總理為主張中國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國際地位平等，因而宣導民族主義；為主張各個國民的政治地位平等，因而宣導民權主義；為主張各個國民的經濟地位平等，因而宣導民生主義」（蔣介石，1983，頁 142）。
- 4 據國民黨 1928 年 6 月頒布的〈設置黨報條例〉（草案），「黨報」指的是「由

- 中央及國內外各級黨部所主持者」，「半黨報」指的是「由本黨黨員所主辦而受黨部津貼者」，而「準黨報」就是指「完全由本黨黨員所主持者」。
- 5 「三校一館」：「三校」為 1931 年先後創辦的申報新聞函授學校、申報職工業餘學校和申報婦女補習學校；「一館」為 1932 年 12 月創辦的申報流通圖書館。後為紀念史量才，更名為「量才新聞函授學校」、「量才職工業餘學校」、「量才婦女補習學校」和「量才流通圖書館」。
 - 6 創造社出版部被上海當局查封，改名江南書局繼續出版工作。《主張與批評》被當局指為「肆意詆毀本黨」，以「反動刊物」被查禁後，創辦人又創辦《自由言論》雜誌，批評國民黨當局政策，呼籲團結抗日。1933 年 12 月，《生活》週刊被查禁，第二年 2 月，原班人馬轉而創辦《新生》週刊。這既是新聞界反控制鬥爭的手段，也是在國民黨嚴厲控制下報刊獲取生存空間的無奈選擇。
 - 7 中共黨報在此時期處於非法「異黨」媒介的特殊態，不對其進行統計分析；自由主義報刊《獨立評論》等的文章基本上是站在維護國民政府統治的根本立場為解決國家和社會問題建言獻策，同時也不似報紙那樣有明確的言論欄目，故而不做統計分析。
 - 8 一次是說服蔣介石結束「七君子案」，一次勸說蔣介石釋放張學良，一次是座談會上堅定蔣介石全面抗戰決心。
 - 9 主要指在《新月》上發表的〈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和〈知難行亦不易〉等文章。

參考書目

- 刁蘇彬（2007）。〈新記《大公報》時期的經營分析〉，《安徽文學》，6: 199-200。
- 〈《大公報》並轉全國各報館〉（1929 年 11 月 29 日）。《大公報》，第 2 版。
- 王奇生（1999 年 12 月）。〈派系、代際衝突與體制內的自省——以 1944 至 1947 年國民黨黨政革新運動為視點〉，「『1949 年的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國北京。
- 王奇生（2000 年 9 月）。〈黨政關係：國民黨黨治在地方層級的運作（1927-1937）〉，「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中國北京。
- 王奇生（2003a）。《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
- 王奇生（2003b）。〈清黨以後國民黨的組織蛻變〉，《近代史研究》，5: 38-82。

- 王奇生 (2009)。《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
- 王奇生 (2010)。《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修訂增補本)。北京：華文。
- 王海洲 (2008)。《合法性的爭奪——政治記憶的多重刻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方漢奇 (主編) (1996)。《中國新聞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田斌 (2004)。〈張季鸞與蔣介石的恩怨〉，《炎黃春秋》，4: 73-75。
- 李金銓 (2011)。〈民國時期的報人情懷與國家想像〉，《二十一世紀》，8: 52-63。
- 李霞 (2006)。〈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新聞法制及其影響〉，《江蘇警官學院學報》，3: 118-119。
- 〈言論自由與立言之態度〉(1930 年 7 月 24 日)。《大公報》，第 2 版。
- 〈言論自由之真義〉(1931 年 12 月 13 日)。《申報》，第 10 版。
- 吳廷俊 (1994)。《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武漢出版社。
- 吳廷俊 (2002)。《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武漢出版社。
- 吳廷俊 (2008)。《中國新聞史新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吳廷俊 (2013)。《考問新聞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吳保豐 (1937)。〈十年來的中國廣播事業〉，中國文化建設協會 (編)，《十年來的中國》，頁 683-732。上海：商務印書館。
- 吳麟 (2010)。《常識與洞見——胡適言論自由思想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俞可平 (2012)。〈增量民主與政治改革〉，《財經》，15: 1-3。
- 胡適 (1932a)。〈獨立評論《引言》〉，《獨立評論》，1: 2。
- 胡適 (1932b)。〈中國政治的出路〉，《獨立評論》，17: 2-6。
- 威廉·裏沃斯著 (高鋼譯) (1986)。〈怎樣衡量新聞自由的程度〉，《國際新聞界》，2: 37-42。
- 陳之邁 (1935)。〈憲政問題與黨政改革〉，《獨立評論》，175: 2-6。
- 陳陽 (2007)。〈成舍我的「兩個效益」思想〉，《新聞愛好者》，5: 42-43。
- 陳漱渝 (2011)。〈胡適與蔣介石：文化異同與思想糾葛〉，《徐州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3: 21-28。
- 許紀霖 (2007)。《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公共交往 (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章清 (2004)。《「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 社。
- 梁軍、肖瀟（2011）。〈史量才《申報》經營模式對當今報業的啟示〉，《青年記者》，26: 77-78。
- 陽海洪、趙平喜（2009）。〈媒介生態學：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新路徑〉，《新聞界》，2: 68-70。
- 黃瑚（2007）。〈論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新聞大學》，1: 44-50。
- 湯向東（2004）。〈國民黨黨員群體結構分析——以 1929 年為中心〉，《江蘇社會科學》，1: 125。
- 湯耀國（2006 年 6 月 28 日）。〈近代民營報紙的發行策略〉，《中華新聞報》，F03 版。
- 復旦大學新聞系新聞史教研室（1986）。《簡明中國新聞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張太原（2006）。《〈獨立評論〉與 20 世紀 30 年代的政治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張太原（2008）。〈「強有力的中心輿論」——《獨立評論》的社會影響〉，李金銓（編），《文人論證：知識份子與報刊》，頁 126-143。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張季鸞（1929 年 12 月 29 日）。〈國府當局開放言論之表示〉，《大公報》，第 2 版。
- 張季鸞（1930 年 4 月 26 日）。〈對於言論自由之初步認識〉，《大公報》，第 2 版。
- 張季鸞（1937 年 2 月 18 日）。〈論言論自由〉，《大公報》，第 2 版。
- 〈報紙如何可以為民眾說話〉（1930 年 7 月 15 日）。《大公報》，第 2 版。
- 楊師群（2010）。〈黨治下的新聞報業——國民黨專制時期（1928-1937）新聞報業的考察〉，《華東政法大學學報》，5: 142。
- 賈海洋、衛俊、嶽謙厚（2011）。〈《大公報》廣告及其特徵——以 1926-1937 年為例〉，《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 139-144。
- 〈剿匪要義〉（1932 年 6 月 19 日）。《大公報》，第 2 版。
- 趙麗華（2012）。《民國官營體制與話語空間——《中央日報》副刊研究（1928-1949）》。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蔣介石（1983）。〈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式〉，秦孝儀（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國府遺教概要》（附錄一），頁 14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中央文物供應社。
- 蔣介石（1984）。〈加強黨的組訓與改善黨政關係〉，張其昀（編），《先「總

- 統」蔣公全集》第 1 冊，頁 524。臺北：臺北中國文化大學。
- 劉哲民（1992）。《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彙編》。上海：學林。
- 蔡銘澤（1995）。〈大陸時期國民黨黨報管理體制的變化〉，《新聞與傳播研究》，2: 76-82。
- 蔡銘澤（1998）。《中國國民黨黨報歷史研究》。北京：團結出版社。
- 〈論保障政治自由之亟務〉（1932 年 4 月 30 日）。《大公報》，第 2 版。
- 賴光臨（1981）。《七十七年中國報業史》。臺灣：中央日報社。
- 蘇雪林（1979）。〈蘇雪林致胡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頁 325-326。北京：中華書局。

Uneven Growth of Newspaper Publishing Companies—Examining Newspaper Growth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ingjun Wu, Jing Shen*

ABSTRACT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an autocratic government. Unlike other powerful totalitari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t was a weak centralized government. Under the control of such a vulnerable regime, the newspaper publishing companies belonging to the ruling party received absolute priority in resource acquisition; for example, these companies were granted generous subsidy funds, the right to interview government personnel, and advertising resources. However, the private and commercial newspapers still had considerable space for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newspapers varied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Newspapers could intervene in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s and affect policies; this function was effective during the first ten years, which demonstrates the brilliance of scholar-run newspapers. Newspapers and journalists obtained some press freedom by engaging in

* Tingjun Wu is professor and supervisor of Ph.D. Candidates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Science & Technology.

Jing Shen is a Ph.D. candidate, working toward the Ph.D. degree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Science & Technology.

difficult battles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they employed various approaches to resist government censorship, and some people even sacrificed their lives. All of these factors vitalized journalism.

Keywords: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newspapers, niche